



史學危機的呼聲

遂耀東／著



史學危機的呼聲

遼耀東·著



76 · 11 · 0884 ·

· 60011 ·

史學危機的呼聲

著者 遼 耀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郵撥：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自序

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尤其一個從事中國史學史教學與研究的史學工作者，我似乎有較佳的機緣。因為我曾先後兩度在中國大陸邊緣的香江居停。先是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這次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已經十年了。因此，我有機會觀察中國大陸史學，所遭遇的兩次作繭自縛的困境。

尤其這十年來，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從「儒法鬥爭」歷史解釋體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儒法鬥爭」是文革集團製造的中國歷史解釋體系。在這個解釋體系下，不僅中國史學受到嚴重的摧殘，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所遭受的侮辱和損害，更是史無前例的。因此，當文革集團瓦解後，立即對文革集團與其製造的中國歷史解釋體系進行批揭與聲討。

雖然，批揭和聲討是每次政治鬥爭結束後，必然出現的場景，祇是這次的調子格外淒厲。當然這種情形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在這些淒厲的聲調中，還屬雜著史學工作者個人十年積怨的宣洩。但經過一陣情緒的宣洩之後，在批揭的過程中，必然會通過理性的判斷而冷靜下來，而且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這種解釋體系的批揭，漸漸發現問題所在了。

尤其文革集團所製造的儒法鬥爭歷史解釋體系，將歷史事實根據政治教條變成單純的公式，對某些歷史的特殊現象，作主觀的論斷與無限擴大的解釋，完全抹殺歷史事實的客觀存在價值。但經過這次批揭之後，不僅發現儒法鬥爭歷史解釋體系脫離了歷史實際，歷史工作者也自覺到，他們長久以來，也完全將歷史依附政治，而為了遷就某個階段的政治情況，難免對某些歷史事實作某種程度的曲解。所以，由歷史工作者批揭儒法鬥爭歷史解釋體系，而產生了自我的反省與檢討。由自我反省與檢討，激起對歷史客觀的自覺，認為不僅批判儒法鬥爭歷史解釋體系，並且對歷史研究必須實事求是的要求，也在史學領域裡漸漸擴大開來。

於是，中國大陸青年一代的史學工作者，開始討論史學理論與方法問題，並且批判史學現狀及過去史學存在的許多問題。在討論與批判過程中，能觸及過去多年史學存在的弱點和缺陷。這些弱點和缺陷是過去的史學研究，為了適應現實的需要，往往以革命與政治為主要

內容，並且強調馬克思主義適於解釋中國歷史。中國歷史與社會的發展，具有馬克思所謂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共性。但卻忽略了中國歷史與社會發展，自身所具有的個性。

當然，這個問題自一九四九年，以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為基礎，形成中國歷史解釋體系時，早已存在了。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從歷史與革命的實際中抽出的總結，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的。因此，以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解釋中國歷史，就是由抽象的總結返回歷史實際。所以，史學工作者所作的任何歷史解釋，不是為了探索歷史客觀的事實，祇是為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作注釋，更進一步證明這些經典著作的普遍的真理性的。因而產生了最初漢儒注經形式的歷史解釋。這種情形到文革以後，有了新的轉變與發展，往往根據馬克思或毛澤東的隻言片字，可以對歷史作無限的演繹與解釋。這種歷史解釋的形式，頗似宋儒解經。但不論前後那一種解釋的形式，雖然在解釋的過程中，都會因為對經典著作的理解或體認的不同，引起絮絮不休的爭議。但這些爭議祇是注疏間的論辯，對經典著作的普遍的真理性的，是無容置疑的。雖然這十年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企圖從過去早已存在的泥沼裡拔足而出，但要想突破那政治經學的框限，仍是困難重重的。於是，他們發出了史學危機的呼聲。

這本集子所收的幾篇文章，是過去十年斷續寫成的。但由於寫作的時間不同，而且往往為了說明一種發展的情況，難免前後有重複的地方。不過，我的態度仍然像我十年前出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一樣：堅持歷史的獨立尊嚴和史學工作者獨立的尊重，是永不會改變的。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夜序於台北

目次

- 自序 (一)
- 批孔，革命史學的樣板戲 一
- 「儒法鬥爭」解釋體系的形成與批判 二五
- 「史學危機」的呼聲 六九
- 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問題 八三
- 〔歷史研究〕的滄桑 九五
- 把胡適當成個箭垛 二五
- 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歷程 二四九
- 「辛亥革命」七十年 二七一

批孔，革命史學的樣板戲

搞點歷史經驗，古為今用

——江青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說：「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仍然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中心。」因此，「深入揭批四人幫，不但要從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上加以清算，而且要從哲學，政治經濟和社會主義理論上進行批判，徹底肅清四人幫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響。」於是，揭批文革集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普遍深入地展開。

同時，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對文革集團時代的史學，予以一個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的

特定名詞。他說文革集團抓史學，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於是「影射史學」變成後來大陸史學工作者揭批文革集團的標竿。在中共十一次代表大會結束後不久，由遼寧大學召集的史學討論會，就是在這個標竿下進行的。這是一次全體性的史學討論會，應邀參加的有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歷史研究」雜誌社，以及來自大陸各地十五個省市高等院校、研究部門等四十三個單位。在會議中，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澍發表了「評四人幫的封建專制思想」，上海師大的吳澤宣讀了「批判影射史學和史學戰線繼續革命問題」的論文。此外，吉林大學、遼寧大學、陝西師大、廣西師大、安徽師大參加討論會的史學工作者也分別提出了論文。參加會議的史學工作者同時「比較深入揭發批判了四人幫的影射史學，澄清了一些被他們搞亂了的理論是非，對許多問題進行了新的討論。打倒了萬惡的四人幫，史學工作者思想大解放。在會議中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生動的反映了史學領域裡的大好形勢」。

在這次的史學討論會中，對文革集團在史學領域裡所留下的問題，包括了「儒法鬥爭問題」、「由奴隸制轉化為封建制過程中的復辟反復辟問題」、「古為今用對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以及「農民戰爭的作用問題」等，都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深入的批判。雖沒有得到共同一致性的肯定結論，但卻劃清了文革集團「影射史學」的輪廓與內涵，對後來中共的史學工作者揭批文革集團所作的

鬥爭發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響。

他們認為所謂文革集團的「影射史學」，不論是打著批孔的旗號，藉著批判孔子的復辟、倒退、反革為名，而實際上是影射周恩來，和對一批革命老幹部的汙蔑；或是文革集團利用「影射史學」作為施展陰謀，「妄想篡黨奪權的一種重要工具」。但卻無法否認這種所謂的「影射史學」，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推翻中國傳統的歷史解釋體系，另建新的解釋體系以來的一個發展階段。更是中共一九五七年以後進行的史學革命成果的展列。但掀開那層「先紅後專」，「古為今用」的史學為政治服務的外衣，將會發現「批孔」是這種「影射史學」的基點。然後由這個基點出發，形成了儒法鬥爭的主線。再以這條主線貫穿了古今的中國歷史。所以，文革集團的「影射史學」從批判孔子開始，像他們在文藝陣線上推出「紅燈記」作為樣板一樣，「批孔」不僅是文革集團，同時也是中共史學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革命樣板戲。

一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的《人民日報》，以第二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楊榮國撰寫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認為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一直陰魂不散。尤其從新民主主義革命

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半個世紀以來，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總在思想戰線上與反孔的鬥爭緊密相連著。於是，由文革集團在史學領域裡發動的批孔序幕就掀開了。

當然，中共清算孔子並不是新鮮的事。雖然，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分珍貴的遺產，對於指導革命運動是有重要幫助的。不過，他在一九三〇年二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就公開提出尊孔讀經是舊文化的代表，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毛澤東所以決定批孔，是為了孔學支配了二千多年來封建社會裡一切人們的思想。如果不搞大批判就沒法去肅清人們頭腦裡的封建遺毒，不足以抵制在這大震盪的世界裡的剝削階級對人們的腐蝕，也就沒法確立社會主義思想，鞏固共產主義的統治地位。自此，近半個世紀來，每當中共在權力鬥爭中，搞上層建築，進行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時，孔子就會遭受清算。

關於中共史學工作者討論或批判孔子的問題，自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後就一直進行著。不過在一九五八年的史學革命發生後，又掀起了高潮。中共所進行的史學革命要打破歷史上王朝的局限性。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對歷史人物重新評價，即是其中的項目之一。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由於「蔡文姬」歷史劇的上演，郭沫若寫了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為曹操翻案，然後掀起中共的史學工作者討論曹操的狂瀾。孔子的思想與政治立場也是歷史人物評價問題，因此也被提

出來討論。

不過，關於孔子問題，因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節的一篇「孔子的唯仁論」掀起了高潮，而引起廣泛的討論。並且對劉節認為孔子的「仁」是超階級的論點作了批判。當時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孔子思想與政治立場兩個問題進行討論。對於這兩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有的認為是「中庸」。不過經過辯論後，肯定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孔子所謂「仁者愛人」的「人」字，到底代表當時那個階級，又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孔子仁的作用，是為了調和統治者與奴隸之間的矛盾。所以，孔子的「仁」祇是為了維護沒落的貴族統治，並不包括被統治階級的「民」。因此，孔子的思想雖然具有某種進步的程度，本質上卻是保守的。另一派認為孔子所謂的「人」是一種泛稱；同時包括統治與被統治兩種階級。雖然孔子「仁者愛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卻不能因此否定孔子的愛民思想，因為孔子是主張人道的，人道就是仁，包括了愛民、養民、利民、富民、教民等。所以孔子的仁是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進步思想，是從人民的立場出發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劉節的「孔子唯仁論」傾向後者。

至於孔子的政治立場是進步還是退步，是革命還是反動，則環繞著孔子是否要恢復周禮；孔子對鑄刑鼎的態度；以及孔子和季氏的關係三個問題討論。關於這三個問題，中共的史學工作者

認為孔子所謂的「禮」是周禮，是一種西周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是奴隸社會的上層建築，孔子恢復周禮的具體政治措施就是「正名」。正名為了貫徹仁的原則，是孔子唯心主義的路線。孔子反對晉國鑄刑鼎，是站在恢復周禮的立場反對的，為了維護奴隸制下的階級社會。孔子在中年以後站在奴隸主的立場，反對新興階級的季氏，所以孔子的政治立場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

由於不同意見存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由中共主管文化當局透過山東歷史學會、山東大學歷史研究所，召集了一次「孔子討論會」，呂振羽、嵇文甫、馮友蘭、高贊非、金兆梓等，都應邀出席了這次討論會。但經過六天的討論，並沒有得到具體的結論。於是更廣泛召集與會者，十二月又在山東召集第二次孔子討論會，而進一步討論孔子的評價問題。雖然與會的歷史工作者對孔子的評價仍然意見不一。但最後還是由周予同、楊榮國、關鋒作了結論：由於孔子學說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作用是很複雜的，各階層、政治集團的政治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打著「尊孔」的招牌，然而他們對於孔子都是「各求所需」的。所以，孔子的學說已經有許多次的變化，各學派有各學派的孔子，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如果不劃清界線，無論是褒是貶，都不能符合實際。因此，對孔子的評價必須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占有有關孔子言行的一切材料，批判地承繼孔子學說中的精華。

對於這個結論，尤其是在馬克思、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研究孔子，劉節是不同意的，因為他反

對用階級理論研究中國歷史。他認為「階級鬥爭的規律，是馬克思、恩格斯後來才發現的。中國古代的孔子和墨子根本沒有什麼階級觀念。硬說他們雙方旗幟鮮明，你一刀，我一槍，陣腳不亂，是不合歷史事實的」。他又提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作為「古為今用」的實例。他強調說如果真的體現了這句話，「可能無形中減少不少敵人也說不定」。

劉節這種反對用階級理論研究孔子的論調，立即被認為是「明確地提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運用於歷史科學研究的錯誤觀點」上。於是對劉節進行嚴厲批判與鬥爭。北京歷史學會更舉行了批判座談會，認為「古代思想家對階級有沒有明確的認識是一個問題，古代社會存不存在階級鬥爭是另一個問題。劉節故意把這兩個問題混淆在一起，認為古代思想家主觀上不認識階級鬥爭，就是客觀上不存在階級鬥爭，這是劉節意識決定存在的唯心主義濫調」。劉節的這樣理論，不僅否定了與敵人鬥爭的客觀性；而且只會使敵人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建設，便於他們復辟。最後劉節終於被整肅了。不過，劉節雖然被整肅，但應用中國史料配合馬克思理論是否適合的鬥爭，並沒有終結。劉節堅持唯仁論的主張，被認為正是「這個鬥爭的反應和繼續」。

因此，「震撼人類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提出破舊立新的口號。所謂「破舊」，也就是要破除傳統中國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孔子思想就是「四舊」的主要支柱，當然必須要徹底破除的。首先由「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井崗山戰鬥團」發動攻擊，指控一

九六二年在山東召開的「孔子討論會」，把孔子捧成中國文化的代表，成了統一中國民族的重心，簡直達到狂熱的地步，都是劉少奇、周揚的陰謀，想要以孔子思想代替毛澤東思想，搞反革命的復辟。所以，「孔子討論會」的目的是大肆宣揚孔老二的仁政和德政。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公開煽動復辟，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惡毒地攻擊三面紅旗，辱罵領導、狂熱地歌頌美化孔老二，攻擊毛澤東思想，妄想把孔老二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打扮成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因此，「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終不能有為剝削階級效勞的孔子思想及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立身之地，不把它們連根拔去，無產階級就不能鞏固」。所以他們認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這具僵屍，徹底剷除反動透頂的孔子思想，是我們一項重要的任務」。

一九六九年「五四」五十週年紀念，（「人民日報」）、（「解放軍日報」）及（「紅旗雜誌」），兩報一刊共同發表聯合社論，指出「多年以來，打倒孔家店還是保護孔家店的問題，一直在進行激烈的鬥爭。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他的黑『修養』中，大肆宣揚孔孟之道，毒害了廣大的青年，為孔家店招魂，充分表現了他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專政和維護一切反動階級利益的反革命面目」。於是，批判孔子和實際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直接攻擊劉少奇「同孔子妥協」，向「孔子招魂」。一九七〇年七月，一篇由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撰寫的「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發表了。在這篇文章裡指出，文化大革命後，毛澤東思想有效的占領教育陣地，是因為劉少奇長期以來，推行以

孔子教育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原因，「為了把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政治騙子所散佈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掃除乾淨，為了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永遠占領無產階級的教育陣地」，就必須批判孔子的教育思想，這篇文章指出孔子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教育家」，認為孔子教育核心「學而優則仕」，是為了授以「奴隸主階級的統治經驗」；孔子以「仁」、「禮」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教授門徒，是為了「麻痺人民，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

以上是文革集團批孔的旗號楊榮國發表「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以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中共的史學工作者進行批判與鬥爭孔子的情形。雖然批判孔子在不同階段的不同政治戰爭中，有不同的政治目的和意義，但是這種鬥爭自中共建立政權以來，一直在繼續不斷地進行著，而且越來越激烈。

二

在楊榮國的文章中，首先提出在孔子生存的春秋期，是一個奴隸制度搖搖欲墜，新興的封建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時代。在當時奴隸與奴隸主，新興地主階級與沒落的奴隸主之間的主要矛盾和階級鬥爭中，孔子到底站在那個階級？楊榮國認為肯定孔子的階級立場，對於上層建築意識形